

浅析买办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鲜乔莹

(西华大学, 四川 彭州 611930)

[摘要] 买办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自鸦片战争以来, 买办对于分化瓦解传统的自然经济、发展商品经济、投资新式企业、推动中国早期工业化和引进西方文化科学观念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买办; 早期现代化; 新式企业; 新式文教事业

[中图分类号] F12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04)03-0031-07

“买办商人的出现, 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明显的一个标志。”^{[1] (P376)} 买办是 19 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最为活跃的一批人, 对近代中国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但长期以来, 我国史学界对他们的研究评价存在着模式化的倾向, 阶级分析的理论占绝对主导地位, 感情色彩较浓厚, 主观贬义性较强, 因而对买办的研究评价也失之偏颇。固然, 买办在中国近代史上确实有其反动的一面, 也起过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桥梁和帮凶的作用。“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操纵、指使和庇护之下, 发挥外国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作用; 通过为外国资产阶级积累资本的方式以积累自己的资本。”^[2] 但我们也不该因此就忽视买办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促进作用。本文拟就买办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做一些探讨。至于买办反动的一面由于史学界论述颇多,^[3~6] 这里就不再赘述。

1 一般来说, 1840 年鸦片战争既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 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在此之前, 中国的商品经济因素虽有所发展, 但对传统自然经济结构并没有太大影响。鸦片战争之后,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 中国被强行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面临严重的挑战, 原有的经济结构被突破, 中国终于艰难地跨入了从传统走向现代化转变的时期。而这一转变过程又是由众多因素交织而成的, 因此是极其复杂的。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理论认为: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包含四大趋势, 即: 衰败

化, 表现为国家政治权威的衰落与立国的经济基础农业和农村的衰败; 半边缘化(半殖民地化), 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下逐渐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殖民地; 革命化, 在衰败化和半边缘化的冲击下, 中国人民被迫起而反抗, 出现各种形式的革命, 如农民战争、辛亥革命、解放战争等; 现代化, 即引进现代生产方式后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 表现为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兴办现代工业、引进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等, 使中国缓慢地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7] (P102~107)} 这四大趋势虽然形式和方向不同, 但是相互交织的, 并最终要归入最后一个过程——现代化过程。即使是革命化的趋势也只是推进现代化的一种运动, 它自身不是目的。因此, 可以说最后只有现代化才能概括中国现代社会转变的广泛内容与宏大目标。^{[8] (P241)}

但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属于外源性现代化, 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情况下被迫启动的, 因此在现代化启动之时, 中国内部的现代商品经济因素微弱, 不可能通过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来实现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一系列转变。只有通过社会外部冲击来打破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 引进现代生产方式并进而推动故有生产方式的转变, 最终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国情分析, 从外部引进现代生产方式有两种途径: 一是被动的, 即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入侵中国的过程中强行带入。这种途径本文暂不作讨论。另一种则是主动引进, 即中国人自己主动地向西方学习, 引进现

[收稿日期] 2000-04-01

[作者简介] 鲜乔莹(1972—), 男, 四川营山人, 四川西华大学讲师,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

代生产方式,促使中国逐步由自然经济转变为现代的商品经济,由农业为本转变为工业立国。这是最有效的途径。然而,从当时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来看,并不是所有阶层都有此动机和能力。

首先,当时的清政府统治阶层在政治上已严重退化。前面我们提到过,中国的现代化是外源性现代化,在启动阶段,国家政权的强弱是引导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当时中国政治权力结构却不能承担这一重任。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农业文明在中国形成了强大的皇权和顽固的农本思想。在中央是高度集权专制;而庞大的官僚系统是由科举选拔的儒家知识分子所组成,既缺乏专业和技术知识,又缺乏独立负责制和创新精神,且囿于“天朝大国”和“夷夏之防”观念,漠视外界变化,抗拒外来文明。更何况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丧失主权,面对外敌的入侵,清政府只是忙于与西方列强周旋以求苟且偷安。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没有能力领导现代化运动和主动地引进现代生产方式。虽有部分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较多的开明官僚和绅商发起、领导实施了洋务自强运动,但其目的却是维护清王朝腐朽统治,具有明显的保守性。只能说是为了应付危局而仓促进行的小修小补,缺乏西方企业由自治城市兴起而形成的个人主义和契约关系,而且服从于传统官僚运作机制。改革的规模非常有限,没有形成举国上下一致的全国性运动。“因此,洋务运动是一种局部的、严重畸形的早期现代化运动。”^{[9] (P10)}

其次是当时占有社会财富较多的传统地主阶层。他们握有较多的社会财富,拥有可以投资于现代生产方式的足够资金,但他们却受视土地为唯一社会财富的传统观念束缚,宁愿投资于购买土地、放高利贷,也不愿投资于有风险的现代工商业。再加之在中国传统经济结构之下,商业依附于农业,地主兼营商业,商人兼为地主。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且相互转化。因而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相当程度上从属于地主经济。要想依靠传统的地主阶层去主动引进现代生产方式也是行不通的。至于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由于长期生活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下,当猛然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而成为外来文明的直接牺牲者时,从朴素的民族意识出发,产生盲目的排外情绪和行动,以期保持原有的生活状态就顺理成章了。因而也不可能积极投身于现代化运动。

除去这两个在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阶层,剩

下的就只有那些较早地、较多地接受西方文明影响的社会人士如开明的官员或改革派,工商界中的买办和新兴商人了。特别是买办,他们“是当时中国最懂得资本主义知识的一部分人”^{[10] (P129)},不管他们动机如何,也不管他们的步伐是大是小,但在对于引进现代生产方式、促使自然经济解体、兴办现代企业、引进西方文化科学技术方面“却表现了一种自觉的选择”^{[10] (P130)},对于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7] (P108)}

2

买办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推动作用首先表现在其所参与的推销洋货、收购土特产的活动上。这些活动推动了中国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的分化、瓦解,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开埠前,中国基本上是个封闭型的市场,外贸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极小。开埠后,中外实行自由贸易,但由于贸易习惯、语言交流、文化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的障碍以及外商通商区域的限制,西方商人难以直接进入广阔的中国市场。为了开辟市场,使商品流通保持连续性,中外贸易需要一个转化媒介来沟通,于是买办就应运而生了。买办最初受雇于洋行,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帮助洋行推销外来商品,收购内地诸如茶叶、蚕丝等土特产,协助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一切交易,“他们是中外商号之间必不可少的中间人”。^{[11] (P630)}

买办在进口贸易中最直接的作用就是使诸如洋布、洋纱、洋油等洋货由沿海口岸逐步深入内地、由城市逐步深入乡村,并渐为广大国人所接受。如洋布,在五口通商初期,其使用仅局限于城市富裕阶层,而到19世纪末,“无论通都大邑,僻壤遐陬,衣大布者不过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12] (P223~232)}。虽有可能夸张,但洋布取代土布的发展趋势却是明显的。再如洋油,在19世纪60年代只有少量为供应外国侨民需要而输入中国。1878年开始,美孚石油公司通过买办大量向中国推销。一开始年输入量只有1570万升,到1891~1893年,便增至7600余万升。^{[13] (P187)}大量洋货,特别是洋布、洋纱的涌入,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解体。特别是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工业革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洋布、洋纱的成本,使其在价格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又大大便利了洋布、洋纱的输出。于是中国土纱土布迅速被洋纱洋布取代,“纺与织”和“耕与织”的分离也就在所难免,在中国沿袭了千年的自然经济

终于走到了尽头。如在广东东莞,“洋布业兴而织工并歇”。广西贵县,“洋布输入,土制纱布,相形见绌,纺织工业,遂一落千丈”。在浙江,“巡引百里,不闻机声,耕夫()妇,周体洋货”^{[12] (P631~632)}。这些都说明在洋纱洋布的冲击下,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家庭手工业开始与农业分离了。正如恩格斯所说:“由于机器劳动不断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以前世界各国的手工工场制度或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制度,完全被摧毁。”^{[14] (P214)}

从出口贸易来讲,买办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架起一道外国商人同中国农民之间的桥梁,使中国农民被卷入商品经济,从而使农产品生产商品化。农产品生产商品化的发展是自然经济分化瓦解的另一重要表现。在19世纪40~50年代,洋行就常派买办按合同到内地收购茶叶、生丝等土特产,使中国丝茶等土特产贸易出口量激增。茶叶的出口值由50年代每年1000万两增至1873年的3800万两。^{[15] (P146)}随着出口的激增,茶叶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首先在福建、台湾、广东等地,接着是安徽、江西、湖南、四川等省广泛种植,同时还出现一些新的产茶区,如江西义安、建昌、吉安等地都是同治年间才发展起来的新茶区。生丝出口从1845年的13000多担至1893年的90000多担,出口值由1845年的300多万两增至1893年的2500余万两。^{[15] (P147)}桑田面积由此大增,养蚕卖茧的人数也迅速增加。如江阴农民“素业织土布,自洋布盛行其利已薄。光绪中,每人始自内地市茧。……乡人获利,育蚕者骤增,不数年,境内每岁售茧所获逾百万金,且递增不已。”^{[16] (P438)}江、浙、皖、赣、粤、鄂、川等省,原来不饲蚕或饲蚕不多的州县到七八十年代都已广泛饲蚕了,甚至北方各地如河北、山东、河南等省植蚕也日益普遍。其他诸如棉花、烟叶、花生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都有所扩大,商品率也有所提高。除经济作物外,粮食生产商品化也迅速提高。如1894年国产粮食商品值比1840年增加了140%,金额高达2.17亿两。^{[17] (P301)}

过去对于买办这些商业活动的研究由于过于强调阶级性、民族性而将这些贸易统统贬斥为“商业侵略”,称为输出商品、掠夺原料的殖民侵略,买办自然也就成为了外国侵略者的帮凶。诚然,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和国民经济都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但我们不能把同国外的正常贸易简单地用“侵略”二字加以概括。而且当时中国也不可能走回头路,停止对外贸易,回到闭关自守

的状态。现实的要求是在经济上继续发展对外贸易,进口先进机器设备,引进现代生产方式,尽快发展工业,逐步跨上现代化进程。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只收到局部效果,“但就参与对外贸易来说,无论是直接帮助洋行开展对华贸易的买办,还是间接为洋行推销商品或收购我国农副产品供应洋行的新商人,他们都不是民族的罪人”^[18]。相反,他们的商业活动在客观上加强了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平原与山区的经济交往,逐步建立了庞大的商品流通网络,推动了中国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了自然经济的分化瓦解,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创造了条件。因此,在对买办商业活动的研究中我们既要看到其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不利的一面,但同时也不能忽视他们的商业活动对我国早期现代化进程客观上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买办除以洋行买办身分代理洋行买卖之外,往往还自立商号,单独设立商铺,投资于商业。如上海宝顺洋行买办徐润就单独兼营了丝、茶等商号。1859年,他与另一买办曾继圃合开绍祥字号。次年,在温州开设润立生茶号。1861年,又先后开设宝源丝茶土号和立顺兴川汉各货号,经营烟叶、皮油、白腊等土产出口项目。前前后后,他投资的商号不下十三四家之多。另外,还有上海仁记洋行买办徐荫三开设了谦泰利炒茶栈;宝顺洋行买办唐廷枢(景星)先在上海开设了修华号棉花行,随后又与林钦等合开谦慎安茶栈,并在内地开设茶庄7所;^{[3] (P39~40)}德孚洋行买办周宗良、谢克明、浦叔鸿、吴鹤云分别开设了谦和、仁记和、光华、呈祉等4家颜料号;禅臣洋行买办张珍候开设了成康润颜料号^[5]等等。大量买办投资于商业一方面有利于国内工农业生产和满足市场需要,刺激农村、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带动了一些重要口岸及附近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自然经济的分解,为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使传统商人队伍构成发生了变化。买办通过自开商号渗入传统商人队伍之中,而部分传统商人又因受雇于洋行而成为买办,如:叶澄衷原是老顺记商店老板,后为美孚石油公司买办;^{[4] (P245~246)}朱葆三原是五金洋货行主,后就任平和洋行买办;^{[4] (P253~254)}吴少卿原为成顺泰丝栈主,后为瑞记洋行买办。^{[19] (P974~975)}这些变化为传统商业行会的成员结构注入了新鲜的成分,使传统商业行会功能逐渐资本主义化。虞和平先生认为:“传统行会的功能,在组织上是封闭的,严格控制新成员的增加;在业务管

理上是封建垄断的,对成员行号的经营范围和规模严加限制;在生产和经营技能的导向是保守的,不能推进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的改良和交流。鸦片战争之后,通商口岸行会的这种传统功能逐渐发生变化,向着开放化、开拓化和进取化的方向发展。”^{[9] (P44-45)}而“行会功能的这一系列转化无疑是具有现代化意义的”。^{[9] (P51)}

3 买办在为洋行服务的过程中,在较短时期内积累了巨额的货币财富。这笔财富究竟有多大?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数据。黄逸峰估计,在1840~1894年间,买办收入约为4亿两。^{[4] (P69-70)}王水估计,1840~1894年间,买办的职业所得为5亿两。^[20]汪熙则认为,1868~1936年,买办收入约有15.29亿美元。^[21]不论他们估计的数目是否准确,但都说明买办的收入是颇丰厚的,足以投资新式企业之用。同时,在此过程中他们还熟悉了洋行工商企业的管理体系、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掌握了一些洋行工商企业的营销策略,尤其是对新式企业的“市利百倍”深有体会。正是这两个条件使他们成为了最早投资于新式企业的一批中国人。他们投资的这批新式企业也成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开端。

买办投资于新式企业是从附股于在华外资企业开始的。买办对外商企业的附股活动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出现。最典型的是唐廷枢。上海英商的公正、华海、北清三家轮船公司中,唐廷枢都拥有大量股本。华海公司的930华股中由唐集股的有700股;北清公司中唐是华股的领袖和代理人;公正公司中唐是该公司的董事。^{[22] (P127)}著名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从1861年开始集股,不到一年便集股100万两白银,而其中买办商人资本竟占六七十万两。^{[3] (P33)}另一买办唐廷枝仅在1881~1882年期间所附股的外商企业就至少有烟台纺丝局、上海荣泰驳船行、上海申光公司等。^[23]在以前的研究中一般都对华商(包括买办)附股外资企业持否定态度,认为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华商附股外资企业使华商积累了资金、技术、企业管理经验,造就了一批颇有作为的企业家,使部分外资企业转化为民族企业,直接推动了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和社会进步,推动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进步。^[24]

在附股外资企业的同时,买办还大量投资了近代新式民族企业。买办对新式企业的投资有两个流向。一是积极参与洋务运动,投资于洋务企业。

买办和买办商人的投资,是洋务企业资金一个重要来源。这些企业的商股,有相当部分是来源于买办的投资或由买办募集的。如唐廷枢、徐润之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郑观应之于上海织布局、上海电报总局,杨德之于池州煤矿,李文耀之于承德三山银矿等。另一流向则是独立投资建立新式企业。买办独立投资创办新式企业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出现。1858年,广东籍买办甘章就创设了甘章船厂。到七八十年代,买办独立创办新式企业就已有相当数量。如:李松云创立的均昌船厂,唐茂枝创办的中国玻璃工业,陈可良创办的裕泰恒火轮面局,曹子俊、曹子伪创办的上海机器造纸总局,祝大椿创办的源昌碾米厂等。到甲午战争之后,买办独立投资新式企业更为普遍。有人根据中国近代10个行业进行的统计分析,在1872~1913年期间,中国共开设新式企业145家,从已知的202个创办人或投资人中,按其原有身分来归类,其中买办共计50人,占总数的24.8%。^{[5] (P403)}买办投资新式企业不仅人数颇多,且投资规模也较大,“对兴办近代企业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估计在1862至1872年他们为上海六家航运公司提供了百分之三十的资金;1863到1886年为开办煤矿提供了所需资金的百分之六十二点七;1890至1910年为中国二十七家大棉纺厂提供了百分之二十三点二三的资金;同一时期还为中国机器制造业提供了所需资本的百分之三十”。^{[11] (P631-632)}

买办投资于近代新式企业,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首先,不管他们动机如何,买办通过投资于新式企业,引进先进生产方式和技术,不论是洋务企业还是独立投资建厂开矿,都在客观上促进了本国生产方式的转变,使中国原有的以农为本的农业生产方式开始缓慢地向现代工业生产方式过渡。买办对于发展新式企业不仅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而且还在实际上主持了这些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对新式企业的筹备、工程的设计、设备的引进、企业的经营管理等基本上能够做到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作模式办事,从而在客观上对中国工业的早期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过去学术界习惯把新式企业分为官僚资本的、买办资本的、民族资本的,并对前两种持否定态度,认为是帝国主义入侵的产物,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支柱。其实这种认识过于侧重阶级性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管是官僚、买办、商人乃至清政府投资的官办企业,……都是作为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对立面出现和存在的,因此它具有民族性。”^{[26] (P440)}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外国资本的经济侵略扩张。如买办刘鸿生将积累的大部分资金投入火柴、毛纺、水泥等民族工业,加快了当地工业的发展,减少了同类产品的进口。徐润于1876和1878年先后集资创办仁和水险公司和济和水火险公司同国外保险公司相抗衡。胡光镛设立火柴厂与瑞典火柴托拉斯展开了激烈竞争。如果我们对这些客观现象都不加分析地用阶级的观点予以否定,那就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者所应坚持的实事求是态度。

其次,买办的投资活动给当时的社会各阶层起了一个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带动了国人投资新式企业的热情,有利于新式企业的发展壮大。中国早期新式企业的创办者大都是买办,创造了中国工业史上的许多第一。如中国第一家玻璃厂是唐茂枝创办的,第一家造纸厂上海机器造纸局的创办人是曹子俊、曹子伪兄弟,第一家火柴厂燮昌火柴厂的创办人是叶澄衷,第一家机器碾米厂源昌碾米厂的创办人是祝大椿,最早的一家中国船厂是买办甘章创办的甘章船厂,最早的保险公司是由徐润、唐廷枢发起创办的保险招商局等等。同时还有许多企业虽不是由买办最先创办,但在创办过程中买办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量洋务企业如果没有买办的积极参与要想成功是非常困难的。如轮船招商局最初由旧式沙船商人出身的朱其昂主持,招股困难重重,而唐廷枢、徐润接手以后,短时间内即招足100万股本;上海织布局在郑观应入局之前后,其局面也迥然不同。买办在新式企业投资方面所表现出的极大热情以及他们投资活动涉及到各行各业,获利颇丰,这就给社会的各个阶层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变动,促使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中具有现代精神的精英集团的形成,特别是工商实业界精英集团的形成,最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发展。

在引进和传播西学,宣传西方科学技术文化,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所要求具备的文化氛围和心理动力的逐步形成上,买办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买办在与西方的长期接触中,广泛地接触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眼界和思路都逐渐开阔,对中西之间的历史差距比其他阶层有更深感受。于是他们开始自觉不自觉地以近代西方社会为参照物,主张以西方文化改造中国。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改

良主义思想家不少都是出自买办。郑观应、容闳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郑观应(1842~1922年),广东香山。16岁弃学经商,赴上海学商,入外国洋行做买办,后又自己投资经商。在与西方接触并从事近代工商业活动的实践中,他不断思考、探索,成为了一名杰出的改良主义者。其代表作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他的改良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经济方面,最突出的是提出商战思想,特别强调要使国家富强,不仅要兵战,更要注重商战,大力发展工商业。他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富强的主要原因。在《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一文指出:“泰西轮船、机器、火炮之精,汇天地造化之奇,为军国所利用,以此致强,以此致富。若中土仿而行之,势必雄跨四海”。而且不仅要造兵船,还要多造农桑机械和小轮船等民用机器,提出了发展民用工商业的思想。同时提倡大力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摆脱官办的封建束缚,反对国家对工矿企业的垄断和控制,抨击官办企业的腐败,提倡股份制。第二,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在书中抨击了外国侵略者的种种罪恶行径,对洋人的任意妄为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同时还提出了禁烟、救灾、收回海关税权、在外国设领事等主张。郑观应的这些思想比同时期的王韬等更进一步,大大超出了同时代一般人的认知水平。他的思想对于后世影响极大,为19世纪90年代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那一时代寻求真理的人们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思想材料,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青年的毛泽东就曾是《盛世危言》的热情读者,并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启示。^[27]

容闳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最早提出资产阶级的改良计划和推动西学东渐,开了我国留学教育之先河。在他的积极推动和主持下,从1872~1875年,先后有120名幼童被派赴美留学。在这批学生当中出现过一些近代著名人物,知名度较高的有修筑京张铁路的詹天佑、后任北洋大学校长的蔡绍基、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等。^[28]

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买办能放弃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再囿于传统儒学,积极地学习或传播西学,投身于与近代科技文化相联系的新事业,从事文教活动,积极地宣传西学。如徐润积极参与格致书院的创立,成为该书院的董事之一。该书院延聘西方人教授格致之学(自然科学),以广泛地传播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知识为宗旨。广购西学书籍和各种科技仪器供人随意参观,还定期举办科技讲座,

使格致书院成为一所宣传西方科技文化知识的博物馆和讲习所。徐润还在故乡广东香山办有中西义学,吸收家乡贫困子弟入学,其教育结构为传统儒学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并举。同时徐润与其弟徐宏甫等集股创办同文书局,从国外引进机器,印刷出版发行了大量西学图书,还投资创办了香港《循环日报》。唐廷枢于 1874 年参与创办格致书院并任董事,又与容闳一起创办《汇报》,并积极襄助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1881 年又与郑观应、席正甫等人捐助林乐知创办中西书院,在传播西学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朱葆三也先后投资了文教卫生、社会福利事业。他与沈仲礼一起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由沈仲礼任会长,他出任稽核财政、出纳等职。此后又出资捐助兴建了四明医院、吴淞防疫医院、上海公立医院等。在教育事业方面,他投资了上海商业学校、同济医工学校、定海公学、尚义学校、宁波益智学校等。其他的如叶澄衷、虞洽卿等人也都曾投资于文教事业。另外,还有一个朱志尧,在 1898 年创办自然科学杂志《格致新报》,并任主编。在第 1 期上发表了《格致新报缘起》一文,论述了格致的重要性和办报的意义。从中西对比角度出发,提出普及格致,推广近代科技知识是当务

之急,并认为办报能很快使格致家喻户晓。该报向中国及时报道了西方各国的科技发展动态和最新成就,且用语浅近,生动可读,发行后影响颇大。

这些买办投身创办或参与的新式文教事业,虽数量不多,但对当时社会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西学的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的发起起到了促进作用,并为以后新文教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奠定了基础。许多人由此而受到西学启蒙,思想观念也开始更新。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所要求具备的思想文化的转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买办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为中西之间的中介,对近代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启动、文化的移植起到了重要作用。有鉴于此,对买办的看法也不能囿于阶级斗争等因素而一成不变,而应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即认识到他们在近代中国的殖民地化进程中所起的消极影响,同时也不能忽视他们在客观上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只有这样,才有助于买办问题的深入研究,也更符合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

[参考文献]

- [1] 费正清. 中国:传统与变迁[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 [2] 严中平. 试论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6, (1): 81—98.
- [3] 聂宝璋. 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 [4] 黄逸峰, 姜铎, 唐传泗, 等. 旧中国的买办阶级[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5] 黄逸峰. 关于旧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研究[J]. 历史研究, 1964, (1): 21—32.
- [6] 黎光. 1840~1864 年中国的买办商人[J]. 史学月刊, 1957, (1): 11—14.
- [7]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续篇[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8]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9] 虞和平. 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 [10] 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 [11] 费正清, 刘广京.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12] 彭泽益.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2 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 [13] 胡绳.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 [14] 恩格斯. 共产主义原理[A].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210—227.
- [15] 凌耀伦, 熊甫. 中国近代经济史[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2.
- [16] 李文治.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M]. 北京:三联书店, 1975.
- [17] 吴承明.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
- [18] 丁日初. 买办商人、买办和中国资本家阶级[N]. 文汇报, 1987—03—17(5).
- [19] 汪敬虞.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下册)[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4.
- [20] 张萍. 近代买办研究综述[J]. 清史研究, 1996, (1): 111—118.
- [21] 复旦大学历史系, 历史研究编辑部.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291—339.
- [22] 范西成, 陆保珍.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 [23] 汪敬虞. 试论近代中国的买办阶级[J]. 历史研究, 1990(3): 89—108.
- [24] 王中茂, 梁凤荣. 清季华商附股外资企业之得失再认识[J]. 郑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1, (5): 74—78.
- [25] 祝寿慈. 中国近代工业史[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 [26] 夏东元. 洋务运动史[M]. 上海: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2.
- [27] 夏东元. 郑观应传[M]. 上海: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1.
- [28] 毛礼群, 沈灌群. 中国教育通史(第4卷)[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8.
- [29] 徐矛. 上海十买办[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 [30] 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radors and the Early Modernization in China

XIAN Qiao-ying

(Xihua University, Pengzhou Sichuan 610039, China)

Abstract: As a bridge of the trade between late Qing Dynasty and foreigners, compradors contributed much to early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eir going into imports and exports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the collapse of traditional autarkic economy model a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Dealing with foreign enterprises helped them accumulate plenty of money, know the advanced management system, technology and vendition mode of foreign enterprises. Then they used what they learned from the foreign to create their own new-type enterprises which not only indicated the dayspring of Chinese industry era, but also aroused the Chinese fervor of creating new-type enterprises, and started the great change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mode of production in China. It is more important that their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early modernization was not merely confined to physical level. They introduced and promulgated the western learning, and gave impet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mentality and laid a foundation to Chinese new-type education.

Key words: compradors; early modernization; new-type enterprises; new-type education

简讯

北京联合大学召开学报工作座谈会

2004年5月18日,北京联合大学召开了有主管校长冯虹、校级科研机构代表和学报编辑部人员参加的学报工作座谈会。会议由学报主编刘斌主持。刘斌介绍了学报工作情况、学报2004年出版计划及2004—2008年发展规划,特别是学报的指导思想、栏目设置和稿件要求,为校级科研所正确选题与提高投稿命中率提供参考。刘斌表示,学报的发展离不开学校党委和行政的正确领导和全方位的支持,离不开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和帮助,离不开全体编辑人员的同心协力,更离不开全校教师、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学报编辑部将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与时俱进,不辱使命,凭借良好的内外环境和条件,争取各方面的支持,把学报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在座谈发言中,各科研所的代表都表示要积极支持学报的工作,充分利用学报的学术窗口和学术园地的功能,推动学校科研水平提高。特殊教育研究所所长许家成指出,学报的生命力与联大的发展密切相关,要充分利用优势,形成特色领域。北京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马万昌提出,学报的发展只靠外稿是不行的,学报不可脱离学校的办学水平。学报的目标还是应该培养人才,为学校提高教学、科研水平服务。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朱显龙认为,台湾问题研究是边缘问题研究,学报开辟了专栏,提供了机会,很好;但对台研究时效性很强,而学报出版周期较长,所以更适宜发表理论性文章。应用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吴勤学认为,学报应结合理论前沿,关注应用性课题的研究,建立专题性的研究栏目;必须重视学术理论上有所创新的文章,选准突破方向;应加强与各领域一流专家的联系。民族与宗教研究所所长佟洵建议,为了加强鼓励,学报应与科研处联合,每年对学报论文进行评奖;对校外名家稿件也可评奖,进一步提高他们投稿的积极性。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鲍泓提出,学报要办出特色,需要在本校优势学科上打响,对市级重点学科、校级学科多关注,与校级研究所密切配合,从而带动其他学科领域发展;学报还要密切追踪学校重点项目负责人,取得他们的支持;与检索机构联系,扩大学报影响,从而吸引校内高水平教师投稿。社区建设与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李培均建议,学报还可以办得活泼一些,开展学术争鸣、学术讨论,这将有利于提高学报水平。奥林匹克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仰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副所长刘文忠、会展研究所所长唐少清、民族与宗教研究所尹志华、制药工程研究所程红霞等也做了发言。

最后,冯虹副校长做了总结发言。他说,学报的发展是全校教职员工共同注目的,今天各位与学报共同探讨其发展,非常有意义。学报与研究所编研相长、相互支持。北京联合大学的教学与科研要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研究所的发展要与学报相结合,共同提高联大科研、学术水平。

(北京联合大学 学报编辑部 供稿)